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 公共政策

● 王春福 著

Youxianlixingliyiren Yu Gonggongzhengc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 公共政策

● 王春福 著

Youxianlixingliyiren Yu Gonggongzhengc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王春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04 - 7454 - 8

I. 有… II. 王… III. 公共政策 - 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19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204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公共政策学是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在美国的一门新兴学科。1951 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与勒纳出版了《政策科学:在范围与方法上的新进展》一书,标志着公共政策学的诞生,并赋予公共政策学以行为主义的倾向。拉斯韦尔推崇纯科学的方法,主张通过实证研究来寻求政治行为的规则。但拉斯韦尔又把公共政策学看作是关于民主的学问。他所设想的公共政策学是一种能将民主与科学完美结合的学科。从而引发了公共政策学的以追求科学化为主的和以追求民主化为主的两条研究路径。德洛尔是继拉斯韦尔之后致力于公共政策学理论构建的学者之一,他的《公共政策制定检讨》、《政策科学构想》、《政策科学的进展》三部经典著作,进一步详细具体地论证了公共政策学的对象、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公共政策学传统。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公共政策学试图建立的是一门超越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之上的,能够统御整个社会科学的全新的知识体系。然而,至今不仅没有构建起这一全新的体系,而且民主和科学也并没有在公共政策学中实现完美的结合。

在创始人建构多学科体系的号召下,最先进入公共政策学领域操作层面的是运筹学家和经济学家。运筹学在系统分析的旗帜下,把其独特的方法论工具运用到具体政策问题的分析中。经济学家也认为,公共政策学应该是植根于经济学而不是政治学。他们努力把各种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运用于政策问题的分析。其中尤以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最

具代表性。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定量分析技术在政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公共政策学这门社会学科看上去显得更加“科学”,一时间,数字和定量分析技术大量充斥于各种政策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献中,系统分析方法几乎成为政策分析的同义语。经济学所提倡的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选择理论,尤其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一度成为公共政策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假设。这一切将政策研究中心从综合各学科理论的努力逐渐地转向实用的政策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学的政策分析范式。理性经济人假设虽然遭到了赫伯特·西蒙等人的批判,并以有限理性取而代之,但并没有改变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公共政策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伴随着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在方法论上,实证主义方法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主流地位。但是,从60年代开始,实证主义方法就逐渐受到质疑,原因主要在于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立场所导致的事实和价值的分离。这种分离加剧了科学和民主的断裂。到了70年代,政策分析的功效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尽管在这一时期政策分析仍占据主流地位,但已有很多学者更关注促进民主、制度分析和改变社会结构方式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并开始在公共政策领域一显身手,以追求民主为主的政治学路径逐渐占了上风。在方法论上,公共政策的实证主义也走向了后实证主义。在后实证主义的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现实是多重的,不可分割的。人们对现实的认识要受到时间、环境和价值的限制。在社会科学界纷纷对科学主义范式表示怀疑的背景下,公共政策领域也掀起一场批评政策分析数量化的运动。批评者认为,政策制定的问题在于价值而不在于方式。因此,单一的数字和技术可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思想已经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很多学者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欧文·休斯指出,人的思想非常复杂,是无法用理性经济人来加以概括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含

混不清而充满矛盾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政治生活中，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共同发挥作用，个人之间的观点和价值观各不相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过于狭隘。后实证主义者强调公共政策的政治内涵与价值冲突，恢复了价值应有的地位。80年代末，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政策分析会抑制公民参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学者德里昂试图通过倡导“参与性的政策分析”来缓解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张力。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拉斯韦尔开创的公共政策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遵从拉斯韦尔当初设想的蓝图。那个能够统合全部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学并没有出现，民主和科学完美结合的状态仍然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事实上，由于公共政策涉及的学科较多，加上学科科学化的努力与学科对象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现象的价值色彩所形成的内在张力，使公共政策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对公共政策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格局。米勒的设计科学理论（1984）、林肯和古巴的自然研究方法论（1985）、萨巴蒂尔和简金斯倡导的联盟分析框架（1988，1993）、金通的多源流分析框架（1984）等等。在这些新理论中备受关注的是德里翁（1992）、德宁（1993）、莱尔德（1993）和费希尔（1990，1994）等学者所倡导的“参与性政策分析”。公共政策这种各方鼎立的研究态势，还是没有使它摆脱两条路径如何统一的困扰。

公共政策学在我国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最近几年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也相继问世。但从总体上看，能跟踪和把握世界公共政策学前沿，并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政策环境和政策过程的，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很少。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西方80年代以前的水平，片面重视对政策制定过程及其内容的研究，

特别是强调围绕所谓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研究有关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型、规范、原则和方法等等,但是进展缓慢,更多的是套用西方的理论,真正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对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围绕着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作描述性的分析比较多,缺少理论上的提升。政策评价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套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一些名为公共政策学的著述缺乏对政策过程的规律性的揭示和把握,缺乏科学化的政策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因而也就不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智力支撑。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分析,理解上较为肤浅,这也不利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提高与创新。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假设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政策哲学的研究,个别学者偶有涉猎,公共政策学人性假设基本上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大多数学者在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上,继承了西方公共政策学经济学路径的代表性观点,把理性经济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出发点。

目前,国内对公共政策学人性假设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公共政策学领域充斥着舶来品,或过于雷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偶有创新,也多为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拿来主义。公共政策学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非下大气力搞好基础理论研究不可,而对公共政策学人性假设的研究首当其冲。由于经济学的霸权主义和向政治学领域的渗透,更具体地说,由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过分张扬,遮蔽了公共政策学自身的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已成为某些学者构建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种状况如不彻底改观,公共政策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很难有一个大的发展。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符合自身特点,能够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本质和规律的人性假设。由于人性假设上的偏颇,公共政策学的以追求民主化为主和以追求科学化为主的两条研究路径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以“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为出发点,可以为实现两条路径的统一提供一种尝试。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深入研究,

在民主和科学的有机结合上将会有所进展。

公共政策实践活动中的人都承载着各自的利益要求，可以把公共政策实践活动中的人设定为“利益人”。公共政策本质所反映的社会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不同“利益人”之间的关系。把公共政策实践活动中的人设定为“利益人”，符合人的一般本性。需要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利益的无限丰富性。从事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利益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可以从西蒙那里借用一个概念来规定，那就是“有限理性”。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应该是“有限理性利益人”。把“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不仅可以抵制经济学向公共政策学领域的不合理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消除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误导，还公共政策学以本来面貌。“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基本范畴。公共政策学已形成了两条研究路径，即以科学为宗旨的研究路径和以民主为宗旨的研究路径，可以在“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的规定中实现其统一。

本书从“有限理性利益人”的人性假设出发，对公共政策学的出发点、公共政策学的逻辑建构进行了描述，为构建以“有限理性利益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学科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尤其是以“有限理性利益人”的人性假设为前提，对公共政策的实践依据、公共政策的本质、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过程和公共政策利益调控规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全新的视角对公共政策进行了诠释。

本书集作者近20年对公共政策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基本理论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梳理。当然，本书对公共政策学人性假设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从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出发，对公共政策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很多研究还需要深

人。本书仅仅是提出任务而已，目的是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使此问题的研究尽快取得进展，为公共政策学的成熟和完善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作 者

2008 年 8 月于西子湖畔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 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理念	(1)
二 公共政策学的根本宗旨	(11)
三 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前瞻	(14)
第二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学的出发点	(23)
一 人性假设的历史考察	(23)
二 有限理性利益人的人性假设	(35)
三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	(41)
四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学的面貌	(45)
第三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学的逻辑建构	(47)
一 公共政策学体系建构的方法论	(47)
二 公共政策学的逻辑结构	(50)
三 公共政策学的三维建构	(57)
第四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的实践依据	(67)
一 公共政策与公共生活	(67)
二 公共政策与公共权力	(73)
三 公共政策与公共秩序	(79)
第五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的本质	(82)
一 公共政策概念分析	(82)
二 公共政策本质界定的依据	(89)
三 公共政策与公共资源	(95)

第六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97)
一 公共政策的人本取向	(97)
二 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	(101)
三 公共政策与公平和效率	(110)
第七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过程	(124)
一 理性结构与公共政策过程	(125)
二 工具理性与公共政策过程	(129)
三 价值理性与公共政策过程	(132)
四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过程	(134)
第八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制定	(139)
一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描述	(139)
二 公共政策选择的内在机制	(144)
三 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创新机制	(151)
四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因素	(157)
第九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执行	(163)
一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描述	(163)
二 公共政策执行与公共精神	(166)
三 公共政策执行与社会心理因素	(173)
四 公共政策执行与政策网络	(180)
第十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评价	(191)
一 公共政策评价过程描述	(191)
二 公共政策评价中的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	(196)
三 公共政策评价与非理性因素	(202)
第十一章 有限理性利益人与公共政策利益调控规律	(206)
一 主导群体优先规律及实现机制	(206)
二 损益补偿规律及实现机制	(211)
三 多数满意规律及实现机制	(219)
参考文献	(232)

第一章 导论

公共政策学是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公共政策学的诞生是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它以自己特有的学科理念,昭示着服务于公共政策实践的根本宗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无法褪尽其稚气,但却在一步一步向成熟迈进。尽管如此,公共政策学未来发展的任务仍很繁重。当然,这也为学者们在这一学科中纵横驰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一 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理念

公共政策学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公共政策的本质和规律,以提高政策质量,使公共政策更有效地干预社会生活的学科。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揭示了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手段,同时也展现了公共政策学综合性的特征,当然,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它还是一个有待成熟的学科,因为,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公共政策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展现了公共政策学科学性的特征。这也构成了公共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前提条件。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一个学科的独立性。提高政策质量,使公共政策更有效地干预社会生活,揭示了公共政策学的研究目的,同时也展现了公共政策学应用性的特征。这也意味着公共政策学不仅要关注社会生活,而且要干预社会生活。

学科理念是一个学科的灵魂。它规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如何界定公共

政策学的学科理念，公共政策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和依据。他在《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近期进展》一书中，对公共政策学的基本范式作了具体的描述。在他看来，公共政策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它必须使用分析模型、数学公式和实证数据，建立可检验的理论。同时，公共政策学是关于民主的学问，它涉及个人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为前提。追求科学和民主是公共政策学基本研究范式的两个显著特征。拉斯韦尔还明确指出，公共政策学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结构和关系都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工具。公共政策学是一种干预性研究，它要求应用知识和创造力更好地制定政策，干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试图运用自己的智慧发出这样的挑战：人类能够有效地控制并塑造自己的未来。^① 这表明公共政策学就其学科性质来说，不是少数学者关在书斋里进行的纯粹形而上的研究，它一诞生就表现出深切的现实关怀。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开拓人类美好的前景作出应有的贡献。依据拉斯韦尔极具经典性的论述，对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理念可作如下的表述：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干预社会生活，更好地塑造人类的未来。

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理念出发，实现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成为公共政策学追求的核心目标。科学化和民主化在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其表现是拉斯韦尔对公共政策学基本研究范式的科学和民主两个显著特征的界定，引发了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即以科学为宗旨的研究取向和以民主为宗旨的研究取向。以科学为宗旨的研究取向致力于解决公共政策的合理性问题，形成了公共政策学的分析传统；以民主为宗旨的研究取向致力于解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形成了公共政策学的政治传统。两种研究取向，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公共政策理念

^① 参见 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well,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和研究视角。它们各以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侧面为研究对象,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以科学为宗旨的研究路径,秉承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传统;以民主为宗旨的研究路径,使之成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栖身之所。两条研究路径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都失之偏颇。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学干预社会生活、更好塑造人类未来的作用,必须寻找两条研究路径的交汇点,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以科学为宗旨,以分析为途径,以追求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为目的的研究取向,高扬理性的作用,承认理性的唯一可靠性,把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作为核心概念。最初形成的合理性概念是一种理性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概念。“理性主义是指用理性方法去解释宇宙间的现象、用理性分析各种问题和用理性方法去管制个人和社会的生活的各种活动”^①。崇尚理性的传统,发端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人类理性的呼唤。在拉斯韦尔把理性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公共政策学领域后,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理念曾一度成为公共政策学研究领域的主流倾向。

在理性主义公共政策理念的驱使下,形成了公共政策的理性决策模式。现代公共政策理论所说的理性主义或理性化,主要是指特定的公共政策主体为一定的目的,利用一切可以收集的资讯,经过客观和准确的计算或度量,以寻求最佳的公共政策手段和最大值的公共政策结果。^②这种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在公共政策学产生初期,成为公共政策理论界最为流行的决策理论。它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强调人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主体作用,借用古典经济学中利益最大化原则,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在合理计算基础上的一种选择。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认为,政策制定就是依据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确定明确的目标,对所面临的各

① 伍启元:《公共政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38页。

② 同上书,第332页。

种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权衡利弊，从中选择出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效果的政策方案的过程。斯图亚特·S. 内格尔对公共政策分析中的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作了这样的描述：“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合理化：意向合理化、后果合理化和程序合理化。”“意向合理化指的是人们在无论做什么事情时总是力图使收益成本差值为最大”；“后果合理化指的是在制定决策时成功地实现收益成本差最大化”；“程序合理化指的是在拥有足够的信息并且运气不坏的条件下，建立一套能使收益成本差最大化的工作程序。”^①追求最优是理性主义决策模式的根本目的。

追求理性主义合理性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实质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来构建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琼斯。把公共政策制定看作是运用严谨而周密的科学程序和科学分析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提出的人类解决问题的一般逻辑程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理性主义的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形成了以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为目的的公共政策分析范式，并一度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公共政策分析范式。

实际上，这一研究取向最初追求的合理性只是工具的合理性。以追求工具的合理性为前提的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主体知识的全面性、价值取向的中立性、占有信息的完备性、分析模型的真实性和研究对象的固定性。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要满足上述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主体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价值取向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公共政策分析总是在有限信息基础上进行的，完备性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分析模型是人为设计的，同实际过程不可能完全一致；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物质世界的“物”而

^① [美] 斯图亚特·S. 内格尔：《政策研究：整合与评估》，刘守恒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是“人”，不能像对物的观察那样简单。^①

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所依赖的条件，在现实的公共政策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长期以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赫伯特·A. 西蒙认为，规范性决策学所认为的只有理性的行为模式才是决策行为的合理模式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所假设的“全知全能式的理性人”的现实生活条件在许多复杂条件下是不存在的。对把合理性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决策模式的“理性人”假设前提，提出了质疑。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决策模式的基础。查尔斯·E. 林德布洛姆则全面指出了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的局限性，“分析性的政策制定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而且必然为政治的介入留有空隙，以至于：它难免犯错误，而且人们也认为的确如此；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价值和利益的冲突；它太缓慢且成本太高；它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应着手解决哪些问题”。^② 叶海卡·德洛尔从公共政策学的本质出发，对其作了根本性的否定，“政策科学是一门判断与行动的哲学，而不是以科学哲学为基础的科学”。^③ “我们尽可能地寻求科学的标准，利用科学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政策分析是一项‘实践的’而不是‘科学的’工作”。^④

在对理性主义的合理性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寻找克服其局限性的途径。其中一部分学者继续沿着追求合理性的研究取向向前迈进，但对合理性的内涵进行了改造，力图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以此作为界定合理性的基础。工具理性着重于手段

① [日] 药师寺泰藏：《公共政策》，张丹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② [美] 查尔斯·E. 林德布洛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朱国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③ [以] 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④ 同上书，第317页。

对实现目的的可能性，而价值理性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主体的需要。这就克服了理性主义仅仅把合理性同工具理性相联系的片面性。人们的任何选择行为都应该是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把这种合理性概念应用于公共政策过程，寻求科学化和民主化统一的基础，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以民主为宗旨，以政治为途径，以追求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为目的的研究取向，把民主体制作为出发点，以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为核心概念。“合法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②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合法性是一个基本的命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传统型、理性—合法型和个人魅力型。^③韦伯对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经典性的研究，但是，他所关注的只是制度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一个政府也能从其良好的政绩中获得合法性”。^④哈贝马斯把合法性分为制度的合法性和政策的合法性，并把政策的合法性作为分析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权威的一个新的视角。政策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关注的是政策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权能给人民带来什么，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能否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政府的公共政策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可。“合法性说到底是一个政府治理能力的问题，是政府解决社会最棘手的主要的公共问题的能力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是政府的政策能力问题。政策合法性的价

① [法]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② 同上书，第 1 页。

③ [德]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56—60 页。

④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